古今之變
現代中國的困惑

歷 史 學 家 訪 談 錄

李禮 訪談

中和出版
OPEN PAGE

目　錄

自　序　*001*

第一章
許宏 ｜ 中國「文明」從沒有自外於世界　*005*

第二章
趙鼎新 ｜「儒法國家」的形成　*031*

第三章
許紀霖 ｜ 我們依然處在古代中國的延長線上　*049*

第四章
佐藤慎一 ｜ 轉換世界圖景的清末啟蒙者　*071*

第五章
楊奎松 ｜ 中國革命，從溫和到激進的轉變　*085*

第六章
謝泳 ｜ 對國家的迷戀，知識分子的百年際遇　*105*

第七章
狹間直樹 ｜ 中日之間的「亞洲主義」　*123*

第八章
張鳴 ｜ 如何「重寫」中國近代史　*143*

第九章
黃克武 ｜ 歷史變化背後的「思想結構」 *159*

第十章
高全喜｜啟蒙的挫折 ——被遮蔽的新文化運動 *181*

第十一章
施耐德 ｜ 那些中國現代化中的「落伍者」 *205*

第十二章
羅新 ｜ 國家民族主義的幻覺 *217*

第十三章
盧漢超 ｜ 理解中國社會的底層視角 *241*

第十四章
章清 ｜ 從「知識轉型」重審近代中國 *259*

第十五章
馬勇 ｜ 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的展開 *291*

第十六章
梁治平 ｜ 我們必須直面「文明」的死亡和再生 *313*

第十七章
葛兆光 ｜ 未來會如何看待我們這個時代 *343*

後　記 *374*

自　序

當 2021 年春天帶來新的溫暖，一場災難恍惚間慢慢散去，但新的疫情仍在繼續，它已經改頭換面。更為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忽然而至的這場全球疫情已深刻改變了世界。沒有人能預知，未來是否真的會以西元 2020 年為界，深深劃出兩個新舊世界，但毫無疑問，我們已經無法回到過去。

這很可能意味着一個全球化時代的大幅退縮，如果不是暫停的話。病毒帶給世界不安，也讓人們自我封閉起來，甚至目光中多了幾分敵意。這種情緒並非主流，但足以攪起塵埃，特別是當它被互聯網和不同意識形態用放大鏡呈現出來時，不同國家、文化圈很可能由此互相懷疑起來，他們之前的連結和寬容為時尚少，本不牢靠。古老的原教旨主義和新的民族主義或許將再次接管地球一段時間，常抱怨日子平淡無奇的一代人，也忽然觸碰到了一種動盪而不無危險的歷史感。每逢此時，人們總會再次想起一些難以破解的老話題：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的未來會怎樣？

實際上，這個問題受到的關注，近年一直與日俱增。在一個史無前例的全球化時代，人們得以在各種語言、空間之間切換，也激發起重新打量自我的興趣。區別僅僅在於，有些人群對這個話題略顯冷淡，有些人群則格外關心，中國人無疑屬於後者，至少在未來

很長一段時間裡如此。我們是誰？中國的未來會變成怎樣？回答它並不容易，而且需要首先面對另一個難題：古典中國是如何變成今天這副模樣的？

這本書可能和這個話題相當密切，儘管它更聚焦一些東西。它主要討論的是晚清以來的中國「現代」之路，目光聚焦於距離今天更近的歷史時間段。讀者不難發現，近現代史內容佔據了本書多數篇幅，更多時候，「古代中國」只是作為一個背景時隱時現，或作為一種傳統與當下對應，因此「古代」的討論相對不足。不過「古今之變」最重大的轉變樞機實際發生於近代，人們頭腦中的問題意識也始於此時。

所謂「古今之變」，並非古人撫今追昔的感懷或王朝更迭所引發的時間意識，而是對再造國家甚至自身「文明」的一種思考。它首先是一種危機意識，當 19 世紀中後期西方人裹挾新的器物、文化到來時，李鴻章、張之洞這樣的「舊人物」也能立即捕捉到它，並為中國面臨的巨大變局深感不安。此後，它被清末第一代啟蒙者認真思考，並轉化為各種行動。後者試圖重塑一個新的現代民族國家，並把古老帝國裡懵懂的公眾改造為新國民。不幸的是，上述行動起步雖不算太晚，卻異常曲折。在幾個歷史節點，「現代中國」甚至表面上看似成功了，卻很快被發現只是一個個軀殼。

進入 21 世紀，中國因經濟崛起贏得了世界更多目光，無數人希望將這種關注轉化為尊重，並讓這個古老國家重拾歷史地位，甚至再次贏得「軸心文明」時代的榮光。事實卻並非如此，很多時候毋寧說適得其反。一些人為此憤怒，一些人感到不安。不過彼得．沃森（Peter Watson）提醒中國人說，儘管中國技術、體育、

商業、海外投資都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只有當中國能像西方的偉大文明所曾經成就的那樣，在統轄人生重要的問題方面——比如今天我們該如何一同生活在這個人與人截然不同的世界？——換言之，在法律、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以及人文學科領域提出舉足輕重的新思想，我們才能說這個國家在現代世界中成為一個真正重要的角色。」（《20 世紀思想史》〔 *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這位英國傑出思想史學者將此視為中國人的新挑戰，對此一些人可能不以為然，但它正可激發人們去重審「現代中國」的過去和未來。

無論承認是否，我們稱之為「現代」的生活方式，主要來自西方。今天，中國人的衣食住行也不復古典之貌，但「現代中國」就是當下的模樣嗎？中國進入「現代」會遵循一種通用的演化路徑，還是會變成一個相當特殊的例外？這種例外是如何發生的，它是否不可避免？這些疑問、困惑變成了本書的一些討論，卻難以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許我們唯一可確定的是，它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反復討論。特別是當「前現代」與「後現代」迎頭相遇之際，沉重的歷史包袱和虛無的美麗新世界相互纏繞，必將折射出種種悖論和光怪陸離的扭曲。

行文至此，幾個幻想未來的晚清「科幻小說」忽然跳入腦海。梁啟超想像 1902 年之後 60 年的《新中國未來記》，寫到第五回合就寫不下去了；吳趼人筆下的《新石頭記》裡，寶玉到未來去拜訪了一位明君「東方強」，那個文明國家的疆土卻以中國忠、孝、仁、愛等八德來命名。不過我印象最深的卻是蕭然鬱生的《烏托邦遊記》（1906），它描寫了乘坐每晝夜可行五萬幾千里的烏托邦「飛

空艇」向理想「行星」的旅程，作者同樣沒有完成。「我們的太空人還沒有到達目的地，小說就停止了。仿佛這幾位太空人的烏托邦之旅，永遠在空中懸而不決。」王德威先生寫道。他在《想像中國的方法》中犀利地指出，晚清作家很可能已註銷了未來的動力。因為他們未來性的觀點，只不過是「昔日」或現時情懷的重現而已。邁向未來成了「回到」未來。他們的作品並未真正地發現一個新地帶，而是中國傳統時間、歷史觀的復辟。

今天的我們，和一百多年前的他們相比，究竟又提高了多少呢？

第一章

許宏 ｜ 中國「文明」從沒有自外於世界

「一定要把中國文明的形成放在全球文明史這樣一個大的框架裡邊，我們才能看清它的來龍去脈。」

許宏

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頭工作隊隊長。長期致力於中國早期城市、早期文明與早期國家的考古學研究及公眾考古。著有《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大都無城》《東亞青銅潮》《先秦城邑考古》等。

一、民族主義與現代考古學的舶來

李禮：越來越多的人喜歡討論何以中國、或到底甚麼是中國？您也有相關著作，比如《何以中國》。當然您關注的主要是起源，公眾的關注則既包括古代中國，也包括當下。從您的角度看，如何理解這種社會心理？畢竟考古學也一直試圖解決「我們是誰，我們是如何形成」這個困惑。

許宏：對，我有兩個關於古代中國的小書，一本叫《最早的中國》，一本叫《何以中國》。所以搞的現在我好像成了所謂考古學界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了（笑）。這個問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幾年臺灣學者王明珂先生到人大講座，我們也跟着「追星」，當我把《何以中國》送給北大的一位教授時，他說現在討論甚麼是中國的書已經有好幾本了吧，這應該反映了我們的某種整體焦慮。是啊，我想起許倬雲先生的《說中國》、葛兆光先生的《宅茲中國》和《何為中國》，還有本人的這兩本小書也算是跟着湊了個熱鬧。這些書雖然都從不同的角度回溯古代中國，但也是回應當代人的的需求吧？很明顯，我們的確都有點焦慮，說重新定位也好，追求文化認同也好，反正是有這個需求。說起來，考古人參與這個話題，按說也不是很新的，這是百年來國人追求自我定位和文化認同的延續。

不過我記得王明珂先生提醒說，世界各地區人類語言、文化與人種的起源、遷徙與分化，在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前半葉曾是相當熱門的主題。然而從上個世紀 60 年代以來，這些研究除了

在少數地區與部分學者之間外，基本上已无法吸引學者們的興趣。就是說其他國家的學界已經不再討論這樣的問題了，這可能是一個反襯。

李禮：20 世紀初，中國開始從傳統的古器物學、金石學轉為西方考古學，除了引入近代科學，像地質學、生物學，還有深刻的時代背景。記得您提到過，考古學者也都是「求變者」，考古學必須放到百年以來的中國社會史裡，才能更好理解。

許宏：考古學就是舶來品，根本不是甚麼國學，對不對？考古學研究古代的東西，但研究理念、方法和這個學科本身都是非常新的，是一門現代學問。上個世紀初才從西方引進，那時我們跟日本實際上就差一截，日本引進的時間還要早。這樣一個新的學問進來，實際上是和科學理性、追求文明認知這些訴求，以及好多學科一塊舶來的，比如考古學方法論上的兩大支柱，一個是考古地層學，一個是考古類型學，地層學來源於地質學，類型學則是生物學的概念，這二者都是全新的學科。它們是一塊被引進過來的，來到中國正好應一時之需。

考古學當時應該是門顯學，不少人有這種感覺，因為它在中國一誕生，就是要解答國人很迫切想了解的問題：我是誰？中國是怎麼來的？這樣一些本源性的問題。顧頡剛先生他們的「古史辨」，包括胡適先生所言「東周以上無史」，一下給人的感覺是整個中國古史虛無化了。這些思考的背景是最初被西方打蒙了或者說打醒了的狀態。天朝上國那種感覺逐漸退去之後，文獻中的「三皇五帝」

這些以前篤信不疑東西現在不成了，怎麼辦？所以說傅斯年就提出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是他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刊詞上用的一句話，呼籲脫離書齋鑽故紙堆的方法，到田野邊疆去找東西、找史料，中國考古學是這麼起來的，所以它一開始就是顯學，可以說是學術上的尋根問祖。

李禮：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之初，儘管「仰韶文化」被認為是西方學者發掘的，但本土學者很快主導了考古工作，成果頗多。但同時也融入了太多的民族情感因素，記得張光直先生說過，1950 年以前中國考古學的主旋律就是民族主義。我注意到您也指出了這一點，對此您有沒有一些具體的感受？

許宏：現在公認的中國考古學的發端，是 1921 年安特生發掘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這是被當時的中國政府認可的學者在中國進行的首次發掘。實際上在 19 世紀末葉，已經有外國學者在新疆和東北地區做考古工作了，但此前一般被認為是盜掘和掠奪，這種情況當然有，但不能否認他們對中國考古的貢獻。

實際上放開了想一想，甚麼是中國考古學？ 中國考古學是中國人從事的考古學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們如果把它定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的考古活動的話，就不能不承認最初的外國學者在科學方法應用以及獲取歷史信息上的累積之功。那時的測繪手段等我們還沒有，出版的考古報告質量相當好，甚至影響到此後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當然現在我們有越來越多的自信能夠認可這些，以前是根本不認的。不過，就中國考古學的總體來

說，這些外國學者的工作就是個序曲。馬上就是仰韶文化發現百年了（1921），考古學界還有較大規模的紀念活動，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是我們認可的。之後 1926 年「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又到山西去尋找夏王朝的遺跡，根據典籍上線索開始找，到 1928 年，中國本土學者就開展組織國家級的、成建制的大規模考古發掘了，這就是 1928 年到 1937 年的殷墟發掘，在中國考古學誕生不久。

所以說，中國考古學一開始就走上了以本土學者為主的探究之路，這跟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不一樣，那裡是歐美學者主導的考古學，對不對？甚至一直到現在也是，美洲不用說了，印度、埃及、兩河流域都是，而中國則具有鮮明的本土特色，是學術上的尋根問祖。由於是本國學者主導考古工作，肯定有利的一面不少，比如甲骨文，一旦進入了民國學術大家的法眼，也就結束了長期以來一直被作為藥引子，被當成中藥吃的命運。我們的學術大家可以通過像《說文解字》這樣的工具書作為橋樑和紐帶，迅速打通古今，辨識出甲骨文。1899 年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甲骨學在 20 世紀的第一個 10 年就開始了，這個是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古文字研究比不了的。

也大體與此同時，隨着外國侵略，民族主義在中國興起來了。一方面，我們被打得找不着北了，開始有一個救亡圖存的問題，救亡圖存後邊就要有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在這裡並非貶義詞。就是說要建構文化認同，對不對？但另一方面，科學理性、文明開化的理念同時也進來了，我們知道要求真逐理，追求歷史真實，歷史語言研究都要科學化。這是當時國人思想的兩大主線，但這兩條主線對於國人來說，並不是一直都能穩妥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而是經

常糾結和擰巴，因為後邊有一個民族情感的問題，民族情感一旦參與了學術探究，把它放到一個甚麼位置，就是值得嚴肅思考的問題了。

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例子就是傅斯年先生後來在日本侵略東北之際，組織學者撰寫《東北史綱》，到現在沒有人把它作為嚴肅的學術著作，因為當時要服從於整個救亡圖存這樣大的需要，甚至早年民族辨識的工作已經開始了，但因為面臨這樣大的國族危機而趨於淡化，顧頡剛就曾撰文《中華民族是一個》，倡導民族團結，一致對敵。像西北史地研究實際上也是這個時候興起來的。邊疆的問題比較嚴峻，西北史地因此受到重視。後來的五族共和、中華民族是一家，都是救亡圖存的產物，學者也都強調這寫提法。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甚麼脫離於社會的純學問，都是要放在大的歷史背景下去看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拉長中國歷史，建構文化認同，就成為新生的考古學的一個重要責任。現在所說的民族偉大復興，注重考古學的社會意義，其實和 100 年以前的思潮是有內在的關聯的。

二、跳出中國看中國

李禮：您是否留意到，我們似乎特別喜歡把歷史追溯得更久遠，它似乎成了民族自豪感的一個重要來源。儘管從顧頡剛先生等人提出「古史辨」後，很多人懷疑，部分中國古文明可能是建構的。

許宏：我給日本講談社版《中國的歷史》系列的第一本寫推薦序，最後那段我引了英國劍橋大學著名考古學家倫福儒教授（Colin Renfrew）的一段話：「現在，（考古學）已成為世界各國許多人都感興趣的一個領域。其部分原因是，它使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充分地了解本國的歷史。但是，如果把注意力只集中於本國，那就是沙文主義。考古學還使我們有可能把每個國家的早期歷史看作整個人類更大範圍的歷史的一部分」。

現在我們越來越多地從全球文明史的視野來看中國文明，任何事物，必須把視野放開才能看得真切，對不對？我最近幾年一直愛說的兩句話。一個是只懂考古已經搞不好考古了。因為目前處於信息爆炸的時代，學科之間必須滲透和合作，需要突破學科界限，尤其是科技使考古插上了翅膀，考古學應該是在人文社會科學中跟自然科學最接近的一個學科。

第二就是只懂中國已經搞不清中國了。我想談的就是一種文化呼籲，很多事情只懂中國已經搞不清楚，看不清楚，對不對？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談中國問題，必須把它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視角下去看。那麼像民族主義在其中起了一個甚麼樣的作用，作為本土學者，當考古面向公眾，該怎麼把握這些，都是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

李禮：不少人注意到您不久前出版的《東亞青銅潮》，這是一種全球文明史的嘗試嗎？跳出中國觀察中國，是這種寫作立意嗎？

許宏：《東亞青銅潮》是我「解讀早期中國」系列小書的第四本，

的確是希望跳出中國來觀察中國的一個嘗試。現在看來，這四本小書雖然在出版時有各自的機緣，但回頭看還是有其內在的邏輯性的。如果說《最早的中國》是着眼於二里頭都邑這一個點，屬於對早期中國的微觀考察的話，那麼《何以中國》就試圖回溯到二里頭之前數百年的龍山時代，捋清二里頭崛起的脈絡與動因，屬於中觀考察。而《大都無城》是視野從二里頭貫通到明清北京城，對中國古都做了動態解讀，就屬於宏觀考察了。《東亞青銅潮》則試圖把東亞青銅文明的緣起放到歐亞大陸青銅文明的大視野下去觀察，就可以稱為大宏觀了。

這本書的副標題叫「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我從公元前4700年前仰韶時代零星的出土銅器開始捋起，對縱貫龍山時代、二里頭時代、二里崗時代的青銅潮前鋒和外緣做了大掃描，對核心區域——中原青銅禮器文明及其衝擊波更是濃墨重彩，用考古材料勾勒出了殷墟時代之前東亞地區接受歐亞大陸內陸青銅文化影響而發生文化社會巨變的宏闊圖景。這本書的風格仍然是材料取勝、述而不作的，但從中可以看到作為廣域王權國家的最早的「中國」，在進入青銅時代後起步，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提速時代也就開始了。從二里頭到殷墟，青銅器的數量增加，體重和形體增大，從僅10餘厘米高的單薄小爵到高1米餘重800多公斤的大方鼎，意味着中原王朝國家對銅、錫、鉛礦開發和供應的控制能力在逐步加強。以商文明為主幹，在東亞大兩河流域的黃河和長江流域形成更大的青銅文化交流網，也帶來了更大範圍的社會整合——地方將資源和物資向王納貢，而由王將作為身份地位標誌的青銅禮器再向下分配，從而確立了對王朝的一元化的納貢制度。這一文化交流

網絡的擴展，正是中國青銅時代文明發展的成果與動力，更成為秦漢帝國版圖形成的前提，奠定了古代中國的基礎。

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中國西北地區是開放的前沿陣地。在絲綢之路之前，還有一條橫貫歐亞大陸的青銅之路。可以說，青銅禮器及其鑄造術，催生了早期中國，而作為外來因素的青銅冶鑄在其中起到了比較重要的催化作用。

三、中國文明的特徵和「短板」

李禮：對於「禮制」您似乎多有研究，比如二里頭青銅禮器的生產和使用。一些學者認為，禮樂制度是中國文明的特點之一。如果說「禮制」本質上是一種等級秩序，那麼等級秩序在早期文明其實都程度不一地存在，為何在中國會成為一種綿延久遠的政治符號甚至制度力量？

許宏：中國古代文獻上說的很清楚，禮制就是等級名分制度，用來確定上下、尊卑、親疏、長幼之間的隸屬服從關係。舉行祭祀、朝聘、宴享等政治性、宗教性活動的建築物及使用的禮器，是禮制的物化形式，它們既是社會地位的象徵，又是用以「明貴賤，辨等列」（《左傳·隱公五年》），區別貴族內部等級的標誌物。說起來禮制就是用來辨識身份的，而中國儒家文化從根本上來說就不是講平等的，比如君子、小人分的都很清楚，禮制就是區別人與人之間

的等差，宗法等級制和與此相適應的一套禮樂制度，所體現的就是特權和社會成員間的不平等。

按理說廣義的禮制，哪個早期文明都有，但中國這一套不一樣。人家把青銅這種當時的高科技用來做刀劍，用來做工具和裝飾品等等，古代中國人則把它做成自己認為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祭祀祖先的禮器。很有意思的是，中國最早的禮器爵是酒器。二里頭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正好在這個時候廣域王權國家開始出現了。為甚麼中國人做這類東西，這些禮器別看它小，包括所謂「九鼎」在內，它們的一個特點是具有便攜性，它是可以跟着王族走的，是吧？這套東西代表王權，是身份地位象徵物，這跟西方不一樣。中國二三百年來一次改朝換代，如同割一茬韭菜，從都邑從鱗次櫛比、高度繁盛到屍橫遍野，宮殿在鼎革之際一般都是被摧毀的，都是在否定前朝的基礎上建立新王朝。注意這裡我隨意用的「鼎革」一詞，鼎為傳國重器，鼎易手了標誌着朝代換了。古代中國人把這個看得很重，所以著名藝術史家巫鴻教授說這裡邊有「紀念碑性」，是有道理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基本上很難有延續千年以上的「聖地」，而禮器在這裡就承擔起了作為政治符號的（意義）。從春秋時期楚莊王問鼎於周王室，成語「問鼎中原」中的「問鼎」，到蔣介石蔣公去臺灣帶到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那些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結晶的藝術品，都是對王權的追求。

為甚麼後世中國人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延續着「禮」器和禮制思維，甚至表現出對藝術品的獨佔，我覺得這和中國的政治結構是相表裡的，就是注重建立在家族血緣關係基礎上的權威，從家長、族長到一國的首腦，從周天子到後來的皇帝，完全是為了這樣

一套金字塔式社會結構的穩定，一切都是為了這個秩序服務的。但歸根結底，這些又都是基於定居農耕生存方式的最佳選擇，可以說是不太以個人乃至群體意志為轉移的。

李禮：考古學無疑是對歷史的一種長時段考察，據您這麼多年的觀察、研究，如果有一個長期存在的「中國文明」，它的與眾不同之處或者說特徵到底是甚麼？它的「短板」又是甚麼？比如梁漱溟先生曾認為中國是個過於早熟的文明，由此也帶了一些問題，它比西方文化更高明，卻因「早熟」而沒有得到正常的發展。

許宏：這個問題最不好回答，尤其是像我這樣做考古學研究的，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形而下的「物」，不敢過多地引申到形而上的層面，有一些想法也只能談談自己的感受。就考古學本位而言，人類本來就是自然的產物，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尤其在上古時期人類絕對受到氣候和地緣的極大影響，而形形色色的文化，都可以看作是各區域的人類對當地自然環境與條件的一種適應方式。東亞地區為甚麼到後來形成了稱為「中國文明」這樣一個東西，還需要先從東亞的地形大勢來看，這裡所謂文明的前提是定居和農耕，定居和農耕基本上開始於 1 萬年前左右。我們說整個歐亞大陸西部，是以地中海為中心的。從人類出非洲開始，地中海東岸就是一個大十字路口，文明的交鋒衝突劇烈，許多領域都走在前列。從克里特文明一直到希臘文明，都是海洋文明，那是商業和農業或農牧相結合，屬於外向型的文明。東西方兩邊各自大的地理、地緣因素不同，導致他們處理和自然的關係的方式的不同，也就是文化底蘊的不同，然

後逐漸開始分道，特色增強。

在東亞大陸，定居農耕發展起來後，由於地分南北，所以有稻作農業和旱作農業的差別，建基於此，各地的文化也各具特點。但整個中國像一個大盆地似的，可以看作是一個大致獨立的單元。在500年前的大航海時代之前，東南方向基本上是隔絕的，除了有些漁民間的對外來往，這些往來也沒有影響到整個王朝政治的大格局。西北雖然沒有隔絕人類活動的天險，但高原、高山、荒漠、戈壁，還是構成一定的屏障。在它的中間，以黃河和長江流域為中心分佈的華北大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之間，沒有像阿爾卑斯山那樣的阻隔，兩條大河又都是橫向的，便於交流和溝通，所在在比較早的時候就形成了一個所謂的鬆散的中國互動圈，張光直先生稱其為「中國相互作用圈」或「中國以前相互作用圈」。這個大圈子在北方少數族群南下之際，由於中原之南還有南方可以作為遷移的後方和根據地，使得農耕文明不至於被徹底摧毀和替代，這是東亞大陸農耕文化圈的一個極大的地緣優勢，這種地緣優勢，又成為華夏文明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我把所謂最早的「中國」界定在東亞大陸最早的具有核心文化性質的政治實體的出現、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的存在，這還比較保守。因為再往前上溯，到六七千年的仰韶時代，甚至作為仰韶時代前身的裴李崗文化，有學者認為就已經開始有這種鬆散的中國互動圈性質的聯繫了，而這個應該是文化上的早期中國。

所以中國文明是地地道道的農耕文明，最初這個大盆地裡邊也根本不是鐵板一塊，南方和北方差得很多，南方是紅土地，北方是黃土地和黑土地，最初也沒有一個叫中國的存在。現在被我們稱為特色的東西，是中原王朝文明誕生前後孕育出來的。這個中心形成

之後碾壓其他區域，淡化甚至消弭其他特質。中原文明為甚麼能在東亞大盆地裡脫穎而出，最後其他文化都退出了歷史舞臺，這肯定是各個區域文明競爭的結果。中原文明最終的勝出，與它地處東亞大盆地中部偏北，得地利之便有極大的關係，這是一個從物流到信息網絡的中心，它有開放的優勢，包括最先、最便利地接收外來文化的影響和刺激。從新石器時代直到青銅時代，與內亞接壤的中國大西北，就是當時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中原人從與周邊各族群交往的過程中汲取經驗教訓，最終形成了自身的一套「生活哲學」。

這個勝出的文明給人的感覺很早熟、很世故，它注重血緣關係，注重宗法關係，注重世俗的王權至上而非神權至上，或者可以說就是政教合一。在藝術表現形式上比較質樸古拙，形成「禮樂文明」。最大的特點是非常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注重人倫道德。甚麼叫政治？說白了就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藝術。而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和上游更晚的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人群，感覺都是注重處理人與神之間的關係，到了戰國時期甚至更晚，楚人還「信巫鬼，重淫祀」呢，具有濃重的巫術色彩，結果它們最後都淡出了，而缺乏巫術色彩的、重功利、重血緣的，注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中原勝出了。孔子是怎麼出來的？中國文明是哪來的？就是從這條路徑上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我認為中原中心的最終形成的標誌，是二里頭都邑和二里頭文化的崛起，自此進入了青銅時代、以中原為中心的時代和廣域王權國家肇始的時代。後來的中原禮樂文明儘管朝代更迭，但這套世界觀和價值觀一直延續下來，在相對封閉的、以定居和農耕為基盤的東亞大盆地中，它顯然具有極大的文化涵化的優勢，對周邊區域形

成碾壓的態勢。哲學家趙汀陽教授把這種延續數千年的生長方式解釋為有着強大向心力的漩渦。這個漩渦的向心運動不斷把中原周邊各個地方、各種文化捲入到一起而成為一體，形成所謂的「中國文明」。

四、對宗教信仰、中央集權的一些歷史感受

李禮：徐旭生先生曾說，專業祭司壟斷「絕地天通」的宗教溝通，是上古社會幾次主要進化過程之一。我想問的是，宗教信仰為何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中後來變得式微甚至缺失了。直到今天，中國仍是世界上最為世俗化的大國。如果從一個古代研究者的視角看，會如何理解這一切？

許宏：這個是考古人不好回答的問題，因為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形而下」的東西。我感覺其實全球各地的人群最初肯定都一樣，科學時代之前肯定有個神學時代，原始宗教應該都是相近的。從考古學上來看，文獻記載中所謂顓頊「絕地天通」的時代，我們傾向於把它放到仰韶時代和龍山時代之間，如果強說絕對年代，大體上就是公元前 2600 到前 2300 年這段時間前後吧。「絕地天通」之前，實際上就是說，一開始是各家各戶都可以祭祀的，每家有個祖先神，因為那時還在社會複雜化的初級階段，還都可以祭祀，但後來一些有力的酋長階層或祭司階層出現，就以那些大宗的祖先神作為整個

族群的祖先神了。然後是王的出現、國家出現，有了所謂制度化的政府，這類民間祭祀就不允許了，百姓失去了祭祀權。實際上這個對宗教溝通的壟斷的過程，也就是一個社會複雜化、文明化和國家化的過程。

考古學能觀察到的，有這樣一些現象。建築上，從半地穴式或地面式的小房子、大房子，到高出地面的臺基式宮室；聚落結構上由向心開放的部族居住地，到密閉的、排他的、有序的宮殿區；最常見的陶器由紅陶、彩陶為主變為黑灰陶和彩繪陶為主，彩陶是大眾日用品，彩繪陶（燒製後繪彩）則基本上為貴族所有；聚落的防禦設施從環壕到方形或長方形的城址；墓葬從沒有或罕見葬具、薄葬到棺槨齊備的厚葬；隨葬品從罕見禮器到玉、漆、陶禮器直至各類青銅禮器，從以量取勝到成套出現、注重組合規制。上述仰韶時代向龍山時代過渡階段在方方面面的變化，給人的感覺這是個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大整合的時代。這可以看作是中國文明形成期的第一個大節點，按中國考古學界的提法，大致從此時進入了古國時代或邦國時代。

古代中國為何缺乏彼岸意義上的宗教信仰，是個有意思的話題。一種解釋是中國文明的基盤是純農業，發達的農耕導致人口增長、密集分佈，彼此間人際關係緊張，所以人們的主要着眼點放在解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問題上，關注點集中於社會道德倫理層面。「有用」成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空靈高遠的宇宙由來、彼岸宗教和哲學科學思考等偏於「無用」，也就很少為注重經世致用的古代中國人關注了。我們的一句老話叫「地大物博」，但實際情況很可能是地大物不博，資源並非太豐足，或者儘管豐厚但還是不足以養

活太多的人口。一個另類的觀察是歐美人吃肉基本是挑動物身上最好的部位吃，而中國料理「廣譜食物清單」中，其他族群不吃的鳳爪、豬手和各類動物內臟統統都有，是否暗喻着農耕時代食物來源的短缺。吃飽飯，一直是古代中國人的一個天大的問題。許多特質都是從這裡生發出來的。

張光直先生認為以殷商文明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明就是一種充滿巫術色彩的「薩滿式文明」，但這一觀點沒有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表面上殷商人重鬼神，其實這些鬼神是他們的祖先，其他文明群團的鬼神大多就是鬼神，屬於巫鬼之類，而中原人是祭祖先，這種宗法中的血緣關係，到現在為止在中國人的生活中還是極大的影響，我們缺乏公民意識，彼此之間是稱兄道弟的家人，套近乎都是血緣和擬血緣的那一套，重私德而輕公德。恩格斯等經典作家關於國家的定義最重要的一點，是地緣共同體取代血緣共同體，但是中國的早期國家絕非如此，血緣共同體長期存在。戰國時期的臨淄齊國都城出土的一些標記氏名的陶文看，「同里者大率同氏」，表明聚族而居的傳統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

所以血緣這個東西是中國文明的一個極大的特色，原始社會的那些血緣親屬關係沒有徹底被突破，一切政治結構、社會結構都是建立個在這個基礎上的，所以才有所謂「家國一體」，國、家合為一個概念，一直延續到現代漢語還是這樣。

李禮：今天，越來越多人認同中國文明起源多元論。同時，很多人也常常會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何「周秦之變」後，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會成為一種主流治理方式？

許宏：最近十幾年來開始更多地看閒書，看到黃仁宇先生講中國大歷史，有那幾句話我完全認可。剛才說過，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如何解釋長期存在的中央集權？可能需要考慮以下幾點。

東亞這一片大盆地地貌導致每年東南的季風跟西北的寒流交匯，它們交合得正好的時候是風調雨順，但那種時候是非常少的，碰撞得很厲害的話，就是洪澇災害；沒碰撞着就是乾旱。遇到這些自然災害，第一個要應對的就是賑災，一個地區旱了澇了，糧食不夠吃了怎麼辦，或者上游弄個壩把水攔住了，糧食欠收我跟你借糧你不借，百姓吃不飽，對各國來說都是很大的事兒。那麼，如果你那塊地方屬於我的，這事不就好辦了嗎？統一管理等於說是代價最低的、可以做到利益最大化的。

中國歷史中的大變革，前面說仰韶、龍山時代之交，是可能的「絕地天通」的大變革，構成社會複雜化的第一大節點，而二里頭應該是是第二大節點，二里頭結束了古國（邦國）時代無中心的多元，從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進入有中心的多元，這是王國時代。而秦王朝又是一個大節點，它開啟了輝煌的帝國時代（包括秦漢帝國、隋唐帝國和明清帝國三大階段）。

正如黃仁宇先生說的，賑災之外，就是治水。但治水應該是很晚近的事兒了，最早是東周吧。人定勝天的概念在上古根本就談不上，現在也不可能。時代越早，你受自然束縛就越深，比如大禹治水那個時候，你就跟螞蟻一樣，根本沒有能力去治甚麼水。環境考古學者最新的解釋是，大禹之所以能夠治水成功，可能主要得益於距今 4000 年左右的氣候好轉而並不是人力所為。一旦氣候好轉，季風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復，大洪水等災害自然隨着氣候的好轉

而好轉。但限於當時的知識水平，先民們可能並不知道氣候突變與洪水災害之間的關係，他們將水患的平復歸功於領導他們治水的大禹，自然是合情合理的。這可能就是大禹治水傳說背後的真實故事。應該說，專家的研究結果比較好地解釋了史前洪水的發生和懷疑大禹能否治水成功之間的矛盾。在東亞大陸，大規模的治水要晚到帝國時期，黃河和長江兩大河流統一在一個版圖裡才好治理。

第三個影響中國古代史的要素是防禦北邊。中國這塊大盆地的北邊，畜牧、半農半牧或遊牧的族群一直伺機南下，比如後來的匈奴、所謂「五胡亂華」、拓跋鮮卑、蒙元和滿清。這個構成了華夏族群抱團做大的一個重要的外因。由是我們知道北方族群的南下，構成了中國古代史的一大景觀，沒有中國大北方的參與，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史是無從談起的，甚至可以說，整個中國古代史，就是一部「胡化」的歷史。這說的是秦漢及以後的情形，商周甚至更早的時候，我們不清楚王族是從哪來的，但無論從 DNA 檢測還是體質人類學來看，殷商就有濃重的北方因素，這已不是甚麼學術禁忌。

五、從古到今，中國是一個不斷開放的存在

李禮：記得傅斯年先生曾經質疑，到底誰是諸夏？誰是戎狄？早期中國其實主要是用生活方式、文化來區分不同人群，而且他們還